



专家指“3000万光棍”系误读：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步下降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阳晨

“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3000万男性将要打光棍？”近日，国家统计局对这一热议话题做出回应，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男性比女性多，导致3000万光棍”解读不科学，这3000多万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性别比是108.9。青年当中，男多女少是我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婚恋关系的的确立，受年龄、生活地域、个人品德、教育水平、价值观念、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关于性别失衡的现状、形成原因及其引发的社会误读等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对此做出相应解读。

记者：“3000万光棍”的说法有依据吗？存在哪些误读？

郑真真：首先，男女性别比失衡并不是这次普查才发现的，我国历来就有，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性别比为107.56，1982年为106.30。男多于女的现象存在于70岁以下的人口，包括适婚年龄人口，但老年群体中的女

性多于男性，所以单独把男女人口数量差别提出来讨论没有实际意义。其次，仅从男女人口数量差别很难说会对结婚率、生育率等有什么影响。虽然因男多女少会导致婚姻挤压问题，但这种情况多出现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不是全国普遍现象。

记者：为什么几乎每次人口普查后，都会引发因性别比差异造成的“剩男危机”论？

郑真真：我认为，频频出现类似“3000万男士打光棍”的这种报道，反映了潜意识中的性别偏见。在不少传统媒体中，女性往往具有比较固定的角色，如以妻子、母亲或弱者的形象出现。例如，2000年的人口普查揭示出我国出生人口与性别比失衡之后，在媒体的各类报道中，往往是注重探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将来会导致多少男人找不到配偶，而忽略了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种近乎舍本求末的媒体报道难免对大众产生误导。

记者：从纵向和横向比较，目前我国性别比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郑真真：中国青少年人口的性别比失衡主要是由于持续了3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从2010年以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缓慢下降的趋

势，但离正常范围（105±2）仍有一定差距。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记者：您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2010年下降6.8，反映出哪些社会现象？

郑真真：出生人口性别比在缓慢降低，这是个积极信号，意味着偏好男孩的出生性别选择有所减少，少年儿童性别比有望回归正常。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年轻一代的“生男偏好”在逐渐弱化。农村青年夫妇中传宗接代的意识相对淡薄，对传统的夫妻角色和性别分工持否定观点的比例要高于中年夫妇。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八成以上男女受访者均认为“因生女孩被人瞧不起”是性别歧视，说明人们普遍意识到生男偏好的观念不正确。

记者：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郑真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在生育挤压推动下生男偏好的后果，是一些领域仍存在性别不平等的体现。从生育观念上看，生男偏好的存在是在上千年传统文化和观念的积淀，形成了社会、社区、家庭和父母对男孩

和女孩的不同期望和对待，也与传统家庭中男女角色和分工的不同密切相关。在生育数量急剧减少后，有些夫妇仍然有至少要生一个男孩的强烈愿望，因此出现了生育的性别选择。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开展了专项行动，包括治理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改善女孩生活环境、促进性别平等。近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虽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更为持续的努力，同时还要应对性别失衡带来的负面后果。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源是社会问题。男孩偏好是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家庭需求和个人观念等四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所有的因素都在朝着促进性别平等、弱化男孩偏好的方向变化，会更有利于问题的尽快解决：首先，落实所有相关政策法规，促进各方面的男女平等，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通过乡村振兴，提升乡风文明，改变一些农村地区强化男孩偏好的风俗习惯。并且，通过积极的宣传倡导，促进全社会认识到男孩偏好的社会和人口方面的负面后果会影响到个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从而真正关注这个问题的根源。

巍巍宝塔 初心永照

（上接1版）

在这里，重温初心使命

【红色历史·中共七大】

延安杨家岭，76年前，在雄壮的《国际歌》歌声中，代表全国121万党员的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聚集一堂，隆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这次历时50天的大会，明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使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红色足迹·杨家岭革命旧址】

延安城西北方向约5公里，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巍然矗立。2015年2月1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他动情地说，这里我来过多次，插队时每次到延安都要来看看，每次都受到精神上的洗礼。

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七大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集中概括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落实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要求全党同志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重温初心使命】

初夏的延安，前来革命旧址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十三五”期间，延安接待游客超过2.5亿人次。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馆场，国网嘉兴南湖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王宏韬和同事们整理好着装，齐声诵读。

“国网在延安有张思德服务队，在嘉兴我们也成立了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名称虽然不同，但我们目标一致，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初心和使命。”王宏韬说。

送别袁隆平

（上接1版）

25岁的青年胡胜涛来到这里。他早晨7点乘坐高铁从广州赶来，下午就要返回。10小时路途，只为深深鞠一躬。“人太多了，我只在遗像前待了不到一分钟，可是很值得。”

江苏的母女张秀华、王宇辰，结束深圳的旅程专程赶来。“90后”王宇辰说：“我想和妈妈一起，来向袁爷爷告别。”

前往殡仪馆的柏油路被人群挤满。年轻的外卖骑手，骑着摩托车缓慢穿行。外卖箱里，有满满一箱金色稻穗。下单的人来自广东、福建、重庆……路的左边，身穿蓝色衬衣的“雷锋车队”举起悼念横幅。一排出租车整齐停着，车窗玻璃上贴着“免费接送车”字

样。司机刘浩辉说：“上百台出租车自发组织起来，免费接送从外地赶来的人们。”

路的右边，42岁的水电工郭庆伟站在一辆棕色的商务车旁，车里堆满了口罩。他和朋友买了8000余个口罩，从23日上午9点起为群众免费分发。“昨晚几乎没有合眼，我想为他做点什么。”许多人前往摆放袁隆平遗像的明阳厅。人山人海，却格外静默。一名身穿白衣的中年妇女半跪在遗像前，放下一碗青豌豆。这是袁隆平生前爱吃的菜。她哽咽着说：“您要记得好好吃啊。”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武说：“袁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袁老一直相信，我们会把杂交水稻事业好好干下去。我想，他是放心的。”

这一天，长沙气温23℃。科研工作者说，这是适宜杂交水稻生长的温度。

纪念馆先后在北京、上海、贵州遵义等44座城市开展了55场巡展。不仅如此，纪念馆还升级打造了网络“微课堂”，让更多网友可以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传承的队伍里，还有一群“红孩儿”。穿着红军服，今年以来的几乎每个周末，11岁的宋天溯都会轮流出现在照金纪念馆、薛家寨革命旧址等位于照金的革命纪念馆，为游客义务讲解。

2019年，在父亲的鼓励下，腼腆的宋天溯加入宣讲团。如今，他已成为一个不善言谈的小学生，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讲解员。宋天溯的母亲宋阿静说：“这是对孩子的锻炼，也是在传承革命先锋的精神。”

目前，照金所在的铜川市耀州区打造的“红孩儿”宣讲团，团员已覆盖全区所有中小学校。

照金纪念馆副馆长宋建斌说：“作为基层党建工作者，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要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在这里，蓄能振兴动力

【红色历史·南泥湾变“江南”+“悬崖工厂”】

延安南泥湾，唱着“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士气高昂挺进这里，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滩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照金薛家寨，在海拔1600多米的悬崖上，依靠天然形成的石洞，红军建设了兵工厂、红色医院、被服厂等四个红军寨。最简陋的兵工厂内，却生产威力颇大的“麻撵手榴弹”。

【红色足迹·照金村】

2015年2月13日下午，习近平在延安干部学院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年的涵义。”总书记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

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真抓实干，贯彻精准扶贫要求，做到目标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举措明确，把钱真正用到刀刃上，真正发挥拔穷根的作用。

2月1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又来到照金镇照金村村委会，听当地发展情况和规划的介绍。他希望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干部团结一心，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

【不忘嘱托】

总书记的嘱托，老区人民不曾忘记。不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革命老区如今已然发生巨大变化。2019年5月7日，随着最后两个贫困县延川、宜川脱贫退出，革命圣地延安告别绝对贫困。

近年来，延安爬坡过坎、矢志转型。昔日干旱少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有了“春赏百花秋赏稻”的江南美景；武汉光谷、腾讯众创、北航科创等一批创新创业产业，华为云计算等累计1125家新经济企业落户延安，新经济、新业态欣欣向荣；获批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包茂、青兰等多条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每天115对客货列车通达，南泥湾新机场已与国内27个城市实现通航……

老区不老，容颜日新。近年来，照金村不断发展红色旅游、开办社区工厂等，产业全面开花。当地群众的居住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不但实现了水、电、气、暖、网络等设施全覆盖，超市、银行、学校、医院等一应俱全。在外奔波多年，2019年搬进移民安置小区，37岁的照金村村民张倩终于体会到“稳稳的幸福”：“孩子上学步行10分钟，我上班步行5分钟，每月工资有2000多元，现在我和丈夫动力满满！”

“2020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554元，比2015年增加2076元，现在群众的幸福日子比蜜甜。”照金村党支部书记梁万营说。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如今，漫步在宝塔山下、延河之畔，行走在照金村里、薛家寨上，历经“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峥嵘岁月，这片红色热土阔步走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奋进路上。

“草原额吉”都贵玛：用爱温暖“国家的孩子”



都贵玛（左三）与“国家的孩子”合影。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 内蒙古大学学生 刘可欣 塔娜

因为采访的记者很多，年事已高的都贵玛老人显得有点疲惫，她的女儿旭日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虽说有点累，但妈妈知道媒体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来，她很想把3000上海孤儿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959年开始，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席卷我国，上海和浙江、安徽、江苏等一些城市几十个孤儿院里的3000多名孤儿，因为食品缺乏，导致营养不良，随时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

这些孤儿院的领导纷纷向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求助，希望中央能够帮助解决这一困难。康克清把救助孤儿的问题直接汇报给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请康克清找乌兰夫商量，能否从内蒙古向南方调运一批奶粉，以解燃眉之急。乌兰夫批准此事后，在自治区党委会上提出，可以将孤儿接到内蒙古来抚养。

“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乌兰夫的要求简明果断。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牵头，安排人力、财力、部署转运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务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在孩子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1960年，来自上海、常州等地保育院里的孤儿，前前后后差不多有3000名，他们坐上一列列北上的火车，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内蒙古。后来，这些孤儿被称作是“国家的孩子”。

当时都贵玛工作所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是其中的一个接收地。1961年9月，年仅19岁的都贵玛被分配到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保育院，抚养旗里刚刚接收的28名“国家的孩子”。这个尚未成家的姑娘，经过简单的培训，就成为28名孩子的额吉。

都贵玛说：“当时陆续送来的28名孤儿，其中最小的才刚满月，最大的只有6岁。他们就像嗷嗷待哺的小羔羊，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必须完成！”

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都贵玛，从换尿布、喂奶粉学起，养育着这些素不相识的孤儿们，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

由于气候环境、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些孩子肠胃出现了严重不适，都贵玛心急如焚。为了孩子们的健康着想，她从家里拿来酥油、奶豆腐、红糖这些当时在牧区特别珍贵的食材来做饭。四子王旗有关部门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制定计划，改变孩子们的



百名女大学生讲述100个党史故事

中华民族是一家

□ 内蒙古大学学生 刘可欣 塔娜

初夏的草原，绿意萌动，一阵清风将记忆带回到60多年前，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内蒙古大草原敞开了她如母亲般温暖的怀抱，迎接从南方而来的3000名孤儿，而都贵玛便是草原母亲的缩影。

20世纪60年代初，19岁的都贵玛敢于担当，用自己的勤劳播撒着爱的种子，悉心照顾“国家的孩子”，直至28名孤儿全部回归新的家庭。如今，都贵玛老人抚养长大的28个国家孩子像胡杨一样，已深深扎根在了这片养育他们的草原上。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国家和草原的发展奉献着自

己的力量，用实际行动将这份大爱和善良在广袤的草原上继续传递。草原母亲在名为“爱的抚育”的任务中展现出其独有的女性之美巾帼之力，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谱写写出独有的巾帼华章。

六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而草原巾帼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却亘古长存。作为新时代的女大学生，我们应该学习都贵玛老人的楷模精神，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融合在一起，勇担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贡献新时代女大学生的力量！

遗失声明

李军不慎遗失警官证，警号：021935，有效期：2020年11月8日至2025年11月8日，原警官证声明作废。